



Academic Series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外交学院学术丛书

理性与国际合作：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 理论研究

Rational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Liberalism in World Politics

● 秦亚青 主编



外文出版社

理性与国际合作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秦亚青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性与国际合作: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秦亚青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1

ISBN 978 - 7 - 5012 - 3276 - 5

I . 理... II . 秦... III .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IV . 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6217 号

责任编辑	袁路明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李 琴
封面设计	徐威明
书 名	理性与国际合作: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Lixing yu Guoji Hezuo : Ziyoushuyi Guoji Guanxi Lilunyan- jiu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晨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规格	787 × 1092 毫米 1/16 21 1/4 印张 375 千字
版次印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200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3276 - 5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秦亚青，政治学博士，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外交评论》、《世界经济与政治》、Global Governance等国内外学术期刊编委。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著述有《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专著）、《权力·制度·文化》（专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译著）、《二十年危机》（译著）等。另外，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和论文集上发表《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建构主义的发展空间》、《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等近百篇论文。

外交学院学术丛书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文化与国际社会：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理性与国际合作：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权力与国际安全：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国际安全研究

东亚地区合作与中美关系

美国的亚太联盟

冲突预防

理论专著/教材

政治科学基础

行政监督

国际关系的权力与规范

国际海事诉讼管辖权问题研究

先秦外交辞令探究

总序

外交学院是一所教学与研究型的大学。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中国国际法学会这两大全国性的学会均挂靠在外交学院，为我院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学术上的支撑。《外交学院学术丛书》的出版无疑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

首先，丛书的出版适应了中国的外交学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进入黄金时期的需求。

外交与国际关系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特别是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际形势大变化，中国国内形势大变化，中国外交大发展，国内外大互动。这种形势推动中国的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所谓“黄金时期”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需求大。对于外交学、国际关系等的研究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之旺盛。世界的变化，中国的变化，中国和世界的变化相互影响，这在国际关系中提出了很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中国正在崛起，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中国面临着许多的机遇，也面临大量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需要我们这些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提出一些好的点子。中国发生的事情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的崛起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如果说过去世人对中国的看法不是很重视的话，今天则不然，几乎所有的问题，世人都想了解中国的意见和立场。如何让世界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这就需要了解中、外双方，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国学者应当能够对此作出贡献。

“黄金时期”的第二层含义是热情高。中国研究外交学、国际关系等的学者，看到了这样一个旺盛的需求，他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愿意

为满足上述需要贡献自己的才智。

“黄金时期”的第三层含义是影响深。影响深是指在今天中国和世界的形势下，中国研究外交学、国际关系的学者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们研究的成果是国家所需要的，是人民所需要的，也是世界所需要的。

第二，丛书的出版适应了外交一线的需要。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进入了一个自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活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国无论是在外交理论方面还是在外交实践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形势要求我们对于这些理论与实践创新进行很好的总结。中国的外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忙碌，外交一线的同志每天都有大量的事要处理，很少有时间对我们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进行很好的总结；而我们在外交学院进行教学和研究的这些同志则不同，我们能够坐下来对我们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进行很好的思考和总结。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入发展，中国外交也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处理好这些课题需要好点子，需要一些长远的思考和眼光。此外，国际上也出现了许多有关外交和国际关系的新的概念和理论，都会对国际关系的走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需要我们进行观察和研究。

第三，丛书的出版也是外交学院发展的需要。大学的生命线是教学。外交学院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建新校园，师生的数量都要增加，这一切都需要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教学质量的提高需要学术研究来支撑，研究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

综上所述，《外交学院学术丛书》的出版是恰逢其时。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李嘉诚先生对外交学院学术研究的大力资助；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对我们的一贯支持；同时，我还要向为丛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学院的老师们表示敬意。

《外交学院学术丛书》反映了本院老师和研究工作者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都是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通过对形势的观察，对问题的研究，进行独立思考所提出来的，都属于个人的看法和见解，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指正。

吴建民

2006年10月于北京

前　言　理性与国际合作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历程和学术理念

秦亚青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长期的思想传统，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思想根源上说，洛克、贡斯当、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康德、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等都对自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①就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而言，自由主义一直是主要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营养。如果说1919年威尔士大学国际关系教席的设立标志着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的诞生的话，那么，自由主义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一个重要理论，最初的表现形式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威尔逊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始终是如何在无政府条件下进行国际合作。在下文里面，我要简单讨论涉及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理念、发展历程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目的是使读者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科正式建立之后的第一个重要

^① 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表现了西方政治思想传承，也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请参见第一章《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渊源》。

理论流派，以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为基本标志。爱德华·卡尔在《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两大思潮，即为后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出了一个理论思想一分为二的分析框架，也为国际关系中的两个理论派别界定了名分。^①从此以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历经起落。实际上，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竞争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条主线：现实主义是在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也是在与现实主义的竞争中不断进化的。两种思想的竞争，既推动了国际关系的理论发展，也反映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世界的认知。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1919年—1939年是初始期，其间自由主义思想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导思想，建立国联的努力成为自由主义理念的主要实践。之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基本停顿。194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经历了30年的收缩期，虽然战后国际关系研究重新开始，战争的残酷和理想主义实践的重大挫折使得自由主义在被明确界定为无政府体系的国际关系世界里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国际关系的实践也成为以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军事竞争为主线、以冲突为基本内容的活动，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限于欧洲地区一体化研究。197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是自由主义的复兴期。各种自由主义流派相继兴起，并在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90年代中期至今是自由主义的深化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始结合国际国内等不同层面的研究，也在向不同领域扩展。

（一）初始期：威尔逊理想主义

1919年到1939年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初始期，典型标志是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兴起，典型的实践活动是国际联盟的创建。虽然自由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厚实的思想基础（参见第一章），但是在国际关系领域真正将其作为理论标识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20年。其间，理想主义不但成为外交战略原则，而且曾一度成为主导理论，并体现在建立国际联盟的实践之中。“一战”爆发是人类历史上一幕极其惨重的悲剧。“一战”之前，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政治现实主义的术语，

^① 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但欧洲大国之间的角力和欧洲国际关系的核心战略思想——均势——却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理念。虽然对欧洲百年和平（1815—1914）有着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欧洲均势的结果，有人认为是英国霸权的结果，但权力无疑是这些解释的共同核心，大国政治家和权势人物的秘密外交和外交手腕也是这些解释所欣赏的战略艺术。但“一战”的爆发使人们对这些欧洲惯用的战略提出了质疑。无论是均势还是霸权，都没有阻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一战”结束之后，这种怀疑进一步加强。终于，有些人认为现实主义的战略不能防止战争，有人进而认为，恰恰是这些现实主义的战略原则导致了国际体系战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理想主义出现了，提出理想主义基本观点的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虽然美国受到传统的孤立主义对外政策的影响，没有参加国际联盟，但美国的历史文化和理想信念包含了很多理想主义的成分，所以，威尔逊提出理想主义原则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1917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对国会的讲话中提出了《十四点计划》。在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之中，理想主义的思想和基本原则已经明确地显现出来，其中基本原则有：1) 国际自由贸易和海洋自由通行；2) 民族自决；3) 裁减军备；4) 民主政体；5) 国际组织和国际法；6) 跨国界民间交往。总结起来，重要的理念有四个：首先是自由贸易可以促成国家之间的合作并减少战争爆发的可能；其次是民主体制可以加强和平；第三是国际组织和国际法是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是促进合作与和平的重要保障；第四，民间交往可以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和人民之间的了解。

可以看出，虽然威尔逊十分简短地提出了这样一些原则性的倡议，并且更多地是从一个实践者的角度为其政策提供充分的理由和可信的依据。但从学理角度，这些思想为后来自由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铺垫。后来自由主义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超出《十四点计划》的基本思想框架。所以说，威尔逊理想主义奠定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基础，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兴起。

（二）收缩期：区域一体化研究

194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中期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收缩期。在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本上被挤至一隅。1939

年，卡尔的《20年危机》出版，尖锐地批评了理想主义，亦即他称之为乌托邦主义的思想。卡尔认为理想主义没有正视一次大战期间国际体系的现实，尤其忽略了国家、权力、战争这些国际关系关键词的重要意义，根据理想主义描绘的世界秩序蓝图只能成为空想主义的空中楼阁。卡尔深刻地批判了这种乌托邦主义，并预言如果照此下去，世界会再起大战。^① 事态的发展不幸被卡尔言中，就在《20年危机》交稿之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在其后的时间里，战争虽然阻滞了理论研究和发展，但却迫使人们面对实力较量的现实。“二战”刚刚结束，冷战接踵而至，两极对峙日趋明显，核武器更是加强了硬实力的恐怖色彩，战争的阴云始终没有消散。1948年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为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出版，标志着战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也见证了自由主义的消沉。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几乎将世界推入核战争的深渊。在这种背景之下，现实主义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主导理论，国家实力和实力分配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焦点。一版再版的《国家间政治》更是将现实主义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现实主义的扩张和主导也就是自由主义的低潮。在整个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国际关系研究最为发达的国度，自由主义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如果说自由主义既是一种理论思想，又是一种社会文本的话，那么，当时相信自由主义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作为社会事实的自由主义已经奄奄一息，作为政策导向的自由主义更是名存实亡。但是，像任何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思想一样，自由主义也不会死灭。它仍然发现了一线狭小的天地，这就是欧洲战后出现的区域一体化进程。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区域一体化问题不同于作为对地区本身历史、文化、现实等类型的区域研究。前者追求的仍然是一般性理论，而后者则是对某一特定地区的了解和分析。自由主义复兴之前，区域研究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保留了一小块实验区，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理论。

首先是功能主义。英国学者戴维·米特拉尼（David Mitrany）功能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研究在欧洲区域一体化过程中什么原因使得国家进行合作。他发现，国家之间首先会在低政治领域进行合作，比如欧洲诸国开始的时候是在能源领域（煤钢）进行合作。由于这些领域的政治敏

^① 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感性较低，国家之间相互防范的程度也就很低，所以容易实现合作。一旦在某个低政治领域合作成功，合作会扩展到其他领域。如果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多，国家之间的利益就会融合交错，战争的可能性就会降低。^①这样，米特拉尼首先肯定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继而讨论了国际合作对于促进和平的积极作用。

美国学者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的新功能主义也始于研究欧洲的区域一体化。哈斯发展了米特拉尼的功能主义，其“新”的实质是加入了更强的政治因素。哈斯在米特拉尼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外溢”效应，即一个领域的合作成功可以使合作得到更多人的支持，这样合作就可以外溢到其他领域和利益集团。但如果外溢效应只是在功能性领域展开，合作就可能是短暂的和无法持续的。所以，哈斯认为，更重要的是政治意识和政治一体化。如果地区一体化的目标是不同国家的政治行为体将忠诚、期望等转入一个新的政治中心，这就不能够仅仅在低政治领域进行功能性合作。功能性合作只有超越单纯的实用性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国家之间一体化，形成新的政治实体。所以，政治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根本，政治精英是一体化的中坚力量。^②这样就需要共同价值和信念这些更深层次的推动力。换言之，真正的合作需要坚实的理念基础和政治基础。

其次是卡尔·多伊奇的沟通交往理论，强调不同国家国民之间的沟通交往会起到加强理解与合作的作用，从而减弱战争的危险。多伊奇也是从欧洲区域一体化的实践活动提出这一理论的，但他关注的重点不是以利益考虑和实用主义态度进行的合作，而是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如何加强他们之间的合作和促进一体化进程的。多伊奇认为，一体化对削弱国际体系无政府性具有深刻的意义，在培养人们的合作意识、维护和平和降低战争危险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多伊奇提出了两种一体化形式。一是混合共同体，亦即较小的人类组织通过整合形成民族国家或联邦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基本标志是接受和支持共同的政府性机构。二是多元共同体，指较小的人类组织通过整合形成某种超国家的权威形式，但比起民族国家来要松散，也不需要共同的政府作为必要条件，比如正在建设中的一体化欧洲。多伊奇提出，在多元共同体建设中，共同

^① David Mitrany, *A Working Peace System*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3).

^② Ernst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orces, 1950 - 195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体成员通过合作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和争端。沟通交往这种社会性因素在建设共同体和培养合作意识、合作习惯等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社会的参与和跨国界交往是一体化的重要条件。

在自由主义收缩时期，虽然没有产生重大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欧洲区域一体化提供了一个实践的场所，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和交往沟通理论成为在欧洲一体化实践中汲取营养而发展起来的两种自由主义理论。这些理论不仅延续了自由主义的学统，而且为后来的自由主义复兴做出了重要的铺垫，为1970—1980年代的跨国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甚至以后的建构主义理论提供了营养。在欧洲一体化遭遇由欧洲主要国家民族主义上升而产生的“动脉硬化”症之后，哈斯曾说自己的理论过时了。其实不然，收缩期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既有创新的发展，又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是自由主义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三）复兴期：新百家争鸣时代

197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复兴期。这一时期的开始是以基欧汉和奈合作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为基本标志的。1970年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复兴在实践层面主要是因为美国衰退这个问题引发的。虽然自由主义有着深刻的美国烙印，但“二战”的惨痛记忆和冷战美苏对峙的现实使得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自1945至1970年间没有在美国得到发展的充裕空间，而美国在理论领域的主导话语是现实主义，在实践领域的主导话语是具有现实主义内在逻辑的两极战略和核战略理论。直到1970年代，美国面临了战后历史上最大的挫折：越南战争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越南战争标志着美国作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竟然打不赢一个小国，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则似乎预言美国战后建立起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行将土崩瓦解。这是比越南战争更加严重的事情。霸权衰退成为学界突出的话题和研究重点。

美国霸权衰退使得几个研究议程受到人们的关注。首先是跨国主义研究。人们开始质疑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垄断地位，同时也注意到跨国界

非政府或次政府层面交往的重要性。这就提出了多元国际行为体的概念。^① 1977年，基欧汉和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明确提出国家之间的交往不仅局限于国际机器这一个渠道，国家也不仅有安全利益这一个中心。^② 其次是国际机制研究。这是现实主义引发的研究议题。现实主义在承认霸权衰退的同时，开始为国际秩序担忧，认为美国霸权的衰退也必将使国际机制随之崩溃。理由很简单，“二战”后的国际机制，尤其是国际经济领域的制度安排，是在美国霸权的主导下建立起来并得以运转的，一旦美国权力不济，国际制度也就失去了基础。^③ 但制度研究历来是自由主义的长项，因为自由主义从根本上说认为人性向善，所以制度好坏是决定人行善或作恶的关键。于是，出现了一系列研究制度的自由主义议程，包括专门研究国际制度生成、存在和发展的新制度自由主义。^④

冷战结束进一步激励了自由主义的研究议程。诸多自由主义流派纷纷出现，形成了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的刺激下出现的自由主义百家争鸣的局面。比如，美国在冷战结束伊始，一扫1980年代美国衰退论的阴云，充满了胜利的喜悦。自由主义学者也开始更多地研究民主体制和国际合作、国际冲突之间的关系。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同时，在国际关系研究界，也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将民主与和平密切联系在一起，将冷战结束与美国战略结合起来，将全球化与自由经济结合起来等等。

这一系列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符合美国传统的。冷战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说是舶来品，是欧洲大陆国际关系思想通过摩根索等有影响的思想家在美国的传播，通过华尔兹等重要学者的构建而变得科学化，^⑤ 并且也恰恰能够服务于美国和苏联对立冲突的国际关系现实。于是，权力、权力分配、实力均衡等一系列现实主义思想被接受。这种情景又逐步被美国的决策者所采用，加

^①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Nye, Jr.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②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③ Stephe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④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⑤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之美国有着实用主义的哲学传统，有着迷信科学的忠实信仰，最终形成了美国国际关系领域的主导理论，同时，因为美国在国际关系实践领域的权力和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相应地位，美国的国际关系学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所谓的“普世”国际关系学。

美国衰退使得美国的自由主义流派重新得到了发展的空间，苏联的解体使得自由主义的另外一些学派得到了刺激，所以，到 1990 年代，出现了自由主义百家争鸣的局面。我们说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复兴，一方面是注意到它的继承性。除了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建立之前的思想家的影响之外，当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多继承了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主要是这些理论更加符合理论的标准，理论化程度更高，逻辑推理更加严谨，思想也在不断发展。根据马克·扎奇尔（Mark W. Zacher）和理查德·马修（Richard A. Matthew）的总结，自由主义出现了五个大的流派，包括共和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自由主义（商贸和军事两个分支）、认知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其中又有诸多的研究议程和研究项目。^① 我以为，共和、制度、商业、社会四个流派是自由主义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四大流派。所以，本书对复兴期自由主义的讨论也是集中在这几个重要流派的。

（四）深化期：全球治理与双层博弈

1990 年代中期至今是自由主义的深入发展时期。一方面，冷战结束使得自由主义获得了更加充分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经历了与现实主义的近 20 年竞争，在理论体系和学理意义上都更加成熟。但同时，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开始受到建构主义的挑战。

如果我们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质定位在“合作”上面，^② 那么，在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复兴期，有着两个明显的发展趋势，其创新意义更加明显，实质内容更具前沿性，发展脉络也更加与时代的

^① Mark W. Zacher and Richard A. Matthew,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Charles Kegley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Wadsworth Publishing, 1994), pp. 121–122.

^② 虽然这样的定义不能全面涵盖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内容，但我认为这是该理论体系的一个实质性内涵，也就是，什么原因使理性行为体在无政府条件下进行合作。

特征相关联。一个是复杂系统效应与合作的进化以及全球治理；另外一个是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所谓双层博弈以及更多地借鉴比较政治学的多层面研究。这也应合了国际政治新的发展趋势：全球化使得当今的全球环境和国际关系更加复杂，更加充满变数，确定性的规律在许多情况下已经难以满足人们对理论的要求；国际国内两个继承的大互动也使得原来将国际国内一分为二的做法越来越难以解释当今的世界政治现象。比如，第二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点之一就是国际国内的相互影响，包括国际体系因素对国内进程的影响和国内转型对国际体系的影响等。^①

这些理论强调合作的可能，与自由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所以，本书讨论了复杂适应理论、混沌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比如，研究复杂系统效应的重要学者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就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共同研究过国际合作问题。^②从现实意义上说，后冷战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已经将治理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面。最近，各国就气候变暖问题达成的协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就理论意义而言，这些理论仍在理论前沿的摸索之中。也许正因为如此，它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和挑战性。这些新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是十分值得关注的，因为它们为国际合作乃至生物体合作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

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理思想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反思的结果。国际关系研究的层面很多，但战争/冲突与和平/合作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永恒话题和核心内容。自由主义涉及的问题也很多，但合作始终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根本命题。合作引向和平，冲突导致战争，如果能够解决了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问题，也就回答了战争与和平这一国际关系研究的根本问题。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要做的就是发现和平/合作的条件。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下，理性行为体是否具有合作的可能？在什么条件下，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可以成为可能。简单地说，自由主义国际关系

^① Robert Keohane and Helen Milner eds.,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Keohane,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in David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85–115.

理论的关键词是“理性合作”，核心问题是无政府状态下理性行为体为什么合作。

(一) 合作的可能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为前提预设的。一般来说，国际关系理论都将行为体之间的合作视为和平的重要条件，所以，行为体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的合作就成为一个理论的核心问题。这是一个问题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第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在无政府状态中，具有主权的行为体是否能够合作。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在无政府体系中，合作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现实主义的合作不可能论断是在四个层面上展开推理的。首先，在国际体系层面，无政府性是体系的根本性质。^① 无政府性本身决定国际体系是一个霍布斯原始状态，其中没有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因此也就没有管理和治理，只有争斗与杀戮。所以，无政府性是“战争的宽容性或根本性原因”^②。其次，在国家之间的层面，国家间关系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因为在资源永远匮乏的体系中，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第一性的，这种竞争在实质上是一种零和竞争。所以，利益冲突是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的根本内容；即便出现合作，也只能是权益之计，目的是实现即时的利益。第三，国家层面，国家的最高利益是生存利益。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国家的最高利益是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在一个无政府体系中，由于不存在体系的最高权威机构，国家的生存只能依靠自己。霍布斯丛林的常态是生存竞争，生存竞争是无法妥协的。并且，安全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既然生存竞争是国际体系的常态，国际体系中又不存在可以保证体系秩序和保障体系成员生命的权威机构，国家只能依靠自己的实力来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安全。^③ 最后，国家像人一样，本性是追求权力的。^④ 这近于人性恶的假定。

可以看出，对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否可能这一国际关系研究的根本问题，现实主义在四个层面上的推理结果只能给出一个否定的回

^①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32.

^②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③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5th ed. (New York: Knopf, 1973).